

孔子研究四十年

徐志祥 李金山 主编

巴蜀书社

孔子研究四十年

主 编 徐志祥 李金山

副主编 王洪军 梁方健
陈 东 姜俊杰

巴 蜀 书 社

一九九〇·成都

孔子研究四十年

徐志祥 李金山 主编

※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盐道街3号)

曲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印张 300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0523—386—1/K·83

定价：4.80元

序

1983年我在曲阜孔子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曾说：“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任务是对孔子学说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学术界广泛展开关于孔学的研究讨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许多问题上，自然还存在着意见分歧，但是过去那种把孔学讨论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的“左”倾作风改变了，人们开始把孔子问题当作学术问题来讨论。应该承认，这是一项巨大的进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鸦片战争以来百年受到列强凌辱的屈辱历史终结了，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昂首前进的时代。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五十年代初期，历史学家对于孔子的评述尚称公允。例如范文澜同志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于孔子的论述基本上是客观的。到五十年代后期，“左”倾教条主义逐渐盛行。到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初期竟出现了“批孔”、“批儒”的运动，对于孔子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极尽诬蔑、谩骂之能事。这在事实上无损于孔子的历史形象，却表现了民族自卑的严重悲哀。

1978年拨乱反正，“文化大革命”的偏谬终于得到纠正。于是开始了对于孔子进行科学研究的新时期。近几年来，学术界召开了几次孔子学术讨论会，既不尊孔，也非批孔，而是联系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来进行对于孔子及儒学的科学探讨，这是学术发展的正确道路。

曲阜师范大学的徐志祥、李金山同志主编的《孔子研究四十

年》，对于1949年至1989年四十年间的孔子研究历史进行了系统而又具体的总结，既为专家提供了信息、资料，又为青年学者提供了入门的阶梯，这是孔子研究取得的一项新成就，是值得赞许的。欣闻此书编写完成，于是略述个人关于孔子研究的感想，以为之序。

张岱年

1990年6月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	张岱年
绪论.....	(1)
第一章 研究回顾与展望.....	(5)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前孔子研究的简略回顾.....	(5)
第二节 1949—1957年的孔子研究.....	(11)
第三节 1958—1965年的孔子研究.....	(17)
第四节 十年动乱对孔子研究的干扰和破坏.....	(28)
第五节 1977—1979年的孔子研究.....	(32)
第六节 1980—1983年的孔子研究.....	(39)
第七节 1984—1989年的孔子研究.....	(47)
第八节 孔子研究之展望.....	(57)
第二章 重要问题专题评述.....	(60)
第一节 孔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立场是什么.....	(60)
第二节 如何看待孔子的政治思想.....	(72)
第三节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	(83)
第四节 如何评价孔子的伦理思想.....	(93)
第五节 如何看待孔子的教育思想.....	(106)
第六节 怎样认识孔子“仁”、“礼”的学说.....	(115)
第七节 对孔子的中庸学说如何评价.....	(133)
第八节 如何看待孔子的历史作用.....	(143)
第九节 怎样认识孔子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150)
第十节 关于孔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157)

第三章 著作和重要论文内容提要·····	(166)
第一节 著作内容提要·····	(166)
第二节 重要论文内容提要·····	(188)
第四章 研究孔子的学术机构和团体、学术专刊 和专栏、重要学术活动·····	(303)
第一节 学术机构和团体·····	(303)
第二节 学术专刊和专栏·····	(307)
第三节 重要学术活动·····	(310)
第五章 研究孔子的著名专家学者·····	(335)
后记·····	(359)

绪 论

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恰如一首包罗宏富的英雄交响曲，在她数千年的岁月中，群星灿烂，涌现出了众多才智闪烁的杰出人物。这些人物，虽然生不同时，经历各异，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也不一样，但他们或是以妙语连珠的议论，或是以出奇致胜的谋略，或是以威武雄壮的行动，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谱写了大量风格迥异的乐章。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就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无数杰出人物中最为著名的一位。

孔子是著名的政治家。生活在社会急剧动荡变革的春秋时代，他虽然处在社会的下层，但不逃避社会，也不消极悲观，而是决然奋起，以挽救危局、拯救乱世为己任，以建立大一统的国家为目标，以游说国君进行改良为手段，雄心勃勃，欲安世济民；他一生虽然在政治上屡遭坎坷，但素志不渝，竭智尽力，虽处逆境而顽强不屈；他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却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充分显示了他安邦治国的才华。

孔子又是杰出的思想家。他对他以前的思想体系作了改良，使其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在学思结合、新旧揉合的过程中，铸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他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学术团体——儒家学派，这个学派在当时和后世社会中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更是伟大的教育家和学者。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打破了他以前的那种“学在官府”的旧局面，把被奴隶主贵族垄断的文化知识，传播到了社会的基层；他严肃认真、“诲人不

倦”的教学态度和“学而不厌”、“不耻下问”、“不知老之将至”的好学精神，历来被人们称颂；他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积累的许许多多有益的教学方针和方法，至今依然受到人们的敬佩和被借鉴；他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培养出了众多有才干的学生，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他删诗书，定礼乐，整理典籍，集三代文化之大成，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播和保存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然，孔子终究是个剥削阶级的历史人物，又生活在二千多年以前，他自然难以摆脱那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烙印。他虽然有志和热心救世，但宦海沉浮、屡经风波、坎坷不已的政治生涯，又使他留恋许多古代的东西，从而使他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保守性、落后性；他的思想学说虽然令海内外闻名，但其中也有不少糟粕，也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他在教育事业上虽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也干了一些荒唐事。

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象孔子这样复杂而又有深远影响的人物。生前，他只是一个满腹经纶却不甚得志的布衣，而死后，却被推到超越帝王之上的“至圣先师”的尊位。他的思想不仅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而且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上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地位。多少年来，人们对孔子或褒，或贬，或扬，或抑，或捧为“圣人”，或斥为“秕糠”。但不论作出什么样的评价，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学说曾经对二千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和观念形态发生过重大影响，甚至早已超出了国界，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孔子是当之无愧的。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进行研究和评价，其作用无疑是非同一般的，它对于批判地继承我国历史上优秀的文化遗产，发扬我们的民族新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长期以来，孔子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特别关注，

专门研究孔子者不乏其人，儒学的典籍浩如烟海，研究孔子的书刊文章也汗牛充栋，孔子研究已蔚为中国学术园林中的一个“超级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的孔子研究更是空前活跃，硕果累累，令人鼓舞。近几年来，国际上又出现了一股“儒学研究热”，探讨和重新估价孔子、儒学的当代社会价值，并且得到了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界的重视与支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国际上的“儒学研究热”又促进了我国的孔子、儒学研究的深入。面对着方兴未艾、意义深远的“儒学研究热”，孔子研究又应该具有一番什么样的姿态与心理准备，才能使自己的学术发展适宜于时代、文化的突变与飞跃？时代的进步所需要的是回忆、总结、思考，以及对于未来发展的新途径、新理论、新方法的无穷的探索。中国人常喜欢讲一句老话：不知道过去就不知道未来。任何对于未来设想的努力，无一不是建立在对于历程的回忆、总结、思考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这个回忆与思考作为基础，对于明天的路该如何去走将是不甚了了。基于此，为了促进孔子研究的更深入发展，我们特编写这部要览性的、既有研究成果总结又有指示研究门径的书，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孔子研究的发展历程作一个客观的总结介绍和中肯的评论反思。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研究回顾与展望”。系统地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不包括台湾和港澳地区）孔子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和评价了各个时期孔子研究的特点、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孔子研究的发展方向，根据我们的水平进行了粗略的预测，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第二章，“重要问题专题评述”。本章是为了使读者比较深入地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孔子研究的某一问题的具体情况，进行更深入地研究而写。在这一章里，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孔子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地评述，对不同观点和流

派进行了归纳分析。

第三章，“著作和重要论文内容提要”。本章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出版和发表的研究孔子的著作和重要论文。

第四章，“研究孔子的学术机构和团体、学术专刊和专栏、重要学术活动”。本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孔子研究的动态和队伍建设情况作了介绍。

第五章，“研究孔子的著名专家学者”。本章对研究孔子的国内著名专家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基本学术观点作了简略介绍。

近几年来，一大批青年学者被日益浓厚的“儒学研究热”所感染，希望跨入孔子研究的学术殿堂，为孔子研究献身尽力。但是，当他们接触到浩如烟海的专著、资料、论文时，便无所措手足了。有时，他们翻遍群书，也难得门径。一些学术界、文化界和新闻出版界的朋友，也往往接触自己涉猎不深，并未作过深入研究的孔子研究领域，但需要对其成果作出某种判断，也往往翻了好些书而难得要领。一直从事孔子研究的专家学者，更需要把握孔子研究的进程，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但面对成堆的书刊资料和散居各处的研究成果，他们虽然耗费了许多宝贵的精力，然亦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预期的目的。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的编写，既给读者提供新中国成立以来孔子研究的总体概况，又向读者介绍出重要的细部情况，力争做到使本书集学术性、资料性、工具性于一身，一册在手，既可使读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孔子研究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对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也可按图索骥，省却“踏破铁鞋无处觅”的烦恼。这个目的能否达到，深望读者在使用中不吝指教。

第一章 研究回顾与展望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前孔子研究的简略回顾

由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学说对二千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和观念形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在我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研究孔子者代不乏人，经久不衰，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代表人物及其知识分子，都曾经对孔子及其思想学说进行过不同的研究和评价。

孔子活着的时候虽然不得志，他的思想学说不仅没有受到当权者应有的重视，反而曾多次受到一些人的围攻和讽刺。但是，孔子和他的思想学说也曾受到很多人的称赞和尊敬。他的弟子颜回就称赞他的学说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子罕》）；子贡则称赞说：“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社会上的一般人也评论他：“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墨子虽然反对孔子的学说，但也承认“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

孔子死后，他的名声并没有消失，恰恰相反，在孟子、荀子等人的宣扬下，他的影响日益扩大。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先秦学术界的各个学派对孔子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评价。儒家后学极力赞颂孔子。孟子称赞孔子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之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又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荀子更直接称孔子为“圣人”，并且叫人们去“法仲尼、子弓之义”（《荀子·非

十二子》)。而其他学派则对孔子既有赞誉的地方,也有批评否定的地方。法家就是用两点论的态度对待孔子。如《韩非子》一书,共有三十五段文字说到孔子,其中七处是批评孔子的,其他二十八处则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和称道。道家的《列子》一书,孔子的名字出现了三十二次,其中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杂家的《吕氏春秋》一书,有二十三处说到孔子,其中二十处是肯定孔子的,三处是批评孔子的。

秦始皇靠军功统一天下后,以法家思想为其社会统治思想。因此,在很长的时期内,儒家思想被排斥,受到打击,“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而且,“始皇既坑儒焚典,乃发孔子墓,欲取诸经传”(《御览》卷八十六引《异苑》言)。孔学在当时已经处于不能生存的地步了。

西汉以后,孔子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汉高祖未得天下前曾溺儒冠,根本不把孔子和儒生放在眼里。统一天下后,则认为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爱人”等一套主张对维护自己的统治有用,便推崇孔子。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十二年)十一月,刘邦到曲阜用“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并下令为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建庙。到了汉武帝时期,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儒家思想变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并登上了“独尊”的地位,从此,孔子的地位大大提高,以孔子为祖宗的儒家思想就成了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者及其为其服务的文人学士,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绝大多数都极力吹捧赞扬孔子,系统地继承和发展并修正了孔子的思想学说,把他捧为“圣人”,打扮成救世主。如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谓侍臣曰:‘朕今所在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有的甚至宣称什么“天不生仲

尼，万古长如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

但是，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也有许多文人士敢于对孔子的学说进行批评，对孔子进行否定，甚至把他斥为“秕糠”。东汉时期的著名思想家王充，在其《论衡》一书中专门写了《问孔》，揭露了孔子言行自相矛盾之处，批判了孔子尊古卑今的保守思想，指出了孔子之言“不能皆是”。明代的思想家李贽，也对孔子进行了批评，认为决不能把孔子的话作为“万世之至论”。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士无论对孔子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其研究方法都是偏重于对孔子言行的解释和订正。这虽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但却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实质，因而也就没有也不可能对孔子作出科学的评价。

在封建王朝即将崩溃和灭亡之后，资产阶级学者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发生了新的变化。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批判孔子，指出，春秋时代的孔子，同左立明、司马迁同侪，只是历史上的一个教育家、史学家。历代统治者尊崇孔子，是为了“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诸子学略说》），“孔教是断不可用的”（《演说录》，《民报》，1906年第6号）。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而指出：“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二千余年”（《排孔征言》，《新世纪》，1908年第52期）。

“五四”运动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孔子批判的尖锐程度又前进了一步。吴虞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政治和历史观对孔子进行了严厉地批判。他认为孔子是他生存的那个时代的伟人，而形势发展到自由、平等、博爱的时期，如果再坚持孔子的学说，那就会阻障文化的发展。他在《吃人的礼教》（《吴虞文录》，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1921年版）一文中指出，孔子的礼教是吃人的。胡适进而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孔子及其思想学说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必要的，它对于清除封建统治者对孔子的神化与圣

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在当时，也有许多人尊孔。窃国大盗袁世凯曾经掀起一次尊孔高潮，以复辟封建君主帝制。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为了对革命者实行文化围剿，又掀起了辛亥革命以来第二次尊孔高潮。他不仅亲自到曲阜“朝圣”，并且称孔子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孔府档案》），把孔子之道作为“治国之本”。说什么“举凡国家政治经济之设施，人民思想之轨范，无一不以孔子之道为准”（孔祥熙：《孔子日常生活与礼义廉耻之诠释》，《中央日报》，1935年8月27日）。袁世凯的尊孔是为了复辟帝制，而蒋介石的尊孔，则是为了实行法西斯统治。

蒋介石的尊孔，虽然对正常的孔子研究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对孔子的学术研究依然有了进展。这主要表现在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关孔子研究的学术著作，其中有钟泰的《中国哲学史》（1929年），兰自我的《孔门一贯哲学概论》（1930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31—1934年），嵇文甫的《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1932年），吕思勉的《先秦学术概论》（1933年），周予同的《孔子》（1934年），梁启超的《孔子》（1936年）等等。在这些著作里，作者都是把孔子当作一个思想家而不是当作“圣人”来研究，把《论语》当作一部学术著作而不是当作“圣经”来研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资产阶级学者没有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好的就是绝对的好，所谓坏的就是绝对的坏，对于现实和历史，缺乏分析的态度。同时当时的学术研究由于受到胡适的影响，偏重于研究资料的真伪和文字的考证方面，对于孔子的思想分析的不深，因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去完成对孔子及其思想学说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和作出科学评价的任务。这一历史任务，只能落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史和思想史工作者身上。

早在“五四”运动以后解放前的几十年里，李大钊、毛泽东

等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杜国庠、吕振羽、赵纪彬等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曾经对孔子作过一些科学的研究和评价。

我国早期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曾经对孔子作过比较深入地研究和科学地评价。李大钊同志的思想有个发展过程，因而他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认识和分析的深刻程度，也随之而不同。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李大钊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主张民主主义。因此，在这个时期，李大钊坚决反对把孔子神化，但同时又主张把孔子本身的真孔子与历代君主雕塑的偶像之假孔子区分开来。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李大钊同志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在这以后，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评价孔子，既肯定了孔子的历史贡献和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指出了孔子思想的局限性，作出的结论是科学的。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也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孔子进行历史的、科学的研究和评价。他既肯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优秀的文化遗产，我们都应该加以批判地继承，但同时也指出了孔子的缺点，诸如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等等。

在这一时期，郭沫若、范文澜等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孔子研究中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注意克服“五四”时期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的倾向，走上了科学研究、批评的道路，使孔子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结下了丰硕的果实。

1937年，吕振羽著作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在该书中，作者认为孔子是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代表，“仁”是孔子理论体系的核心，政治、伦理方面的东西都是被派生的，是以“仁”为源泉，而又受其决定的。“仁”是最完美、最善良的先验的精

神，孔子的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正名”是巩固封建主义内部秩序的武器，“礼”是等级名分的尺度。孔子的学说在封建社会占支配地位，因其适合封建主义要求，而且包含着积极因素或伟大的观念。孔子是中国封建时代最早的一个大哲学家，对东方以至世界文化思想，产生过巨大影响。

1939年和1944年，赵纪彬著作的《中国哲学史纲要》和《中国哲学思想》出版。在这两部著作中，作者指出，讲孔子哲学，不但要将他和后世儒学者的思想分开，即使在孔子本人与其正统弟子之间，也需要划分出清楚的界限。孔子哲学的特征是“人本主义”，避而不谈宇宙本体的本质，与其说是唯心论，不如说是经验论；对殷周的宗教文化一面否定一面信仰，取妥协折衷态度，孔子哲学中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三位一体，人生哲学的思想支配了一切。

1942年，范文澜著作的《中国通史简编》出版。该书在论证孔子学说时，认为孔子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礼乐与仁义两部分，是当时士阶层思想的结晶。士阶层的思想有两面性，但保守性多于进步性，妥协性大于反抗性。举贤才、慎刑罚、薄赋敛、重教化是进步的，但把民看成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是保守的。作为偶像崇拜的孔子，随着封建时代的过去而过去了，但是孔子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贡献和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并未过去。他创造的儒学，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确是封建社会集大成的圣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代表。

1945年，郭沫若著作的《十批判书》出版。该书在《孔墨批判》一章中指出，孔子的基本立场是顺应着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帮助乱党，同情人民。孔子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托古改制的体系，“仁道”是为大众的行为，顺应奴隶解放的潮流，是对人的发现。孔子的“天”是自然界流行着的理、法、命，是自然界的必然性，对于这种必然性的制御，则是尽其在我。孔子的天命观有一种